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

经济学

II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上海

1988.9

中国大百科全书

· 经济学 ·

Ⅱ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经济学》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总社：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分社：上海古北路650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装 上海人民印刷制版厂彩图分色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5.25 插页 24 字数 1,396,000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00—0233—5 / F·7

精装(甲)国内定价：34.30元

K

Kade'er

卡德尔, E. (Edvard Kardelj 1910~1979)

南斯拉夫理论家、思想家、政治家, 社会主义自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生平和著作 卡德尔生于卢布尔雅那市的一个裁缝家庭, 早年在卢布尔雅那师范学校学习, 并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34年在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学习, 后在苏联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国, 参加了组织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

是南斯拉夫全国解放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的成员、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 历任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总书记、南共联盟主席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联邦议会主席、联邦主席团委员和新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等职。还被选为塞尔维亚科学院院士、斯洛文尼亚科学院名誉院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科学院名誉博士。

卡德尔主要著作有:《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1972)、《论自治计划制度》(1976)、《自由联合劳动》(1978)等。

经济思想 卡德尔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和矛盾, 强调国家职能只能逐步社会化, 并且首先是从国家经济职能消亡过程开始; 认为国家所有制在初期是必要的, 有积极作用, 但它是公有制的初级形式, 应由公有制高级形式即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取代; 在尊重和充分发挥市场规律作用的同时, 应制定建立在自治基础上的自治社会计划, 用以指导、协调和调节经济的发展。为促进自治经济的顺利发展, 卡德尔认为必须通过劳动的联合, 资金的联合, 以保证各单位的自治, 又保证全国的协调和统一。他还认为, 建立在自治基础上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如果没有实质上的新的联合劳动经济关系体制, 是无法维持和发展下去的。

(全志敏)

Ka'erduo

卡尔多, N. (Nicholas Kaldor 1908~1986)

英国经济学家,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以提出与经济增长论相融合的收入分配论和建议以消费税代替个人所得税著称。

生平和著作 卡尔多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比较富裕的犹太家庭, 父亲是律师。中学毕业后在柏林大学听课。1927~1930年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1932年起, 任

该学院的助理讲师、讲师、副教授, 直至1947年。19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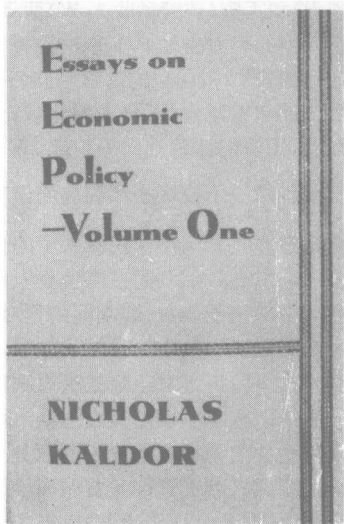


1949年, 去日内瓦任欧洲经济委员会研究及计划组主任。1949年回英国后, 在剑桥大学经济系任讲师, 1952年升为副教授, 1966年晋升教授, 1975年退休, 转为名誉教授。在此期间, 他先后担任过印度、锡兰、墨西哥、加纳、英属圭亚那、土耳其、伊朗、委内瑞拉等国政府的税务顾问, 也出任过联合

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经济顾问。他还两度担任英国工党政府财政大臣的特别经济顾问。1974年, 因其参政有功, 被授予男爵爵位, 成为上议院的终身议员。

卡尔多的经济研究领域很广, 从厂商理论到福利经济学, 从资本理论、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到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 从国际贸易理论到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从30年代起写作的大量论文和报告, 在1960~1979年间先后编成八卷经济文集:《价值和分配论文集》(1960)、《经济稳定与增长论文集》(1960)、《经济政策论文集》(两卷, 1964)、《经济理论论文续集》(1978)、《应用经济学论文续集》(1978)、《税收报告》(两卷, 1979)。

经济理论 卡尔多在30年代的论文尚未跳出传统的边际主义经济学的框框, 但被认为在那时已显出他在理论上的“创见性”。其中有他所命名的“蛛网理论”, 即用供求弹性的相对差异分析市场稳定条件的理论(1933); 有在福利经济学中称为“卡尔多补偿测验”的“补偿原理”。后者是卡尔多在《经济学的福利主张与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1939)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判别社会福利是否提高的标准。新福利经济学在V. 帕累托的“最佳状况”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判断一种经济变化是否使社会福利有所改善的标准是: 在一部分人状况得到改善的同时, 没有任何人蒙受损失。但实际上, 采取一项政策, 在一般情况下, 总会使一些人得到改善, 另一些人受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 又如何判别这个政策的社会福利效果? 卡尔多提出: 假设(不必是实际的)通过重新分配, 使受损失的人从得益者那里得到补偿后, 每个人的状况比变化前都有所改善, 即可判断这一经济变化, 使整个社会的福利得到了



《经济政策论文集》1964年
第1版封面

提高。这是建立在庸俗的边际效用序数论基础上的一种理论。

J. M.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卡尔多的理论兴趣逐渐由微观经济学转向宏观经济学。1940年他发表一篇题为《经济周期模型》的论文,运用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建立新的经济周期的理论,这是卡尔多转向凯恩斯阵营的一个标志。之后,他写了大量有关宏观经济问题的论文,成为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派(新剑桥学派)的一个重要成员。其中最著名的一篇是他在1956年发表的《两种不同的分配理论》。传统的收入分配理论,以边际生产力决定各生产要素的价格说明国民收入的分配,这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卡尔多以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为基础,从宏观入手,结合经济增长来说明国民收入的分配。他把国民收入 Y 分为利润(或财产收入 P)和工资(或劳动收入 W)两大部分;认为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 P/Y 取决于投资率(投资对国民收入的比率 I/Y)和利润的储蓄倾向(利润中的储蓄比率 s_p)与工资的储蓄倾向(工资中的储蓄比率 s_w)之差。在通常情况下,工资的储蓄倾向等于零,即 $s_w=0$,则利润的相对份额就取决于投资率和利润的储蓄倾向($\frac{P}{Y} = \frac{I}{Y} / s_p$)。投资率愈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就愈大。利润的储蓄倾向愈高,则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就愈低。如果利润全部用于储蓄,则利润的相对份额将与投资率一致。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确定了,余下的即为工资的份额。这个分析是对边际生产力决定收入分配的传统理论的否定。卡尔多以后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分析方法上和他的宏观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按照卡尔多的模式,若工资的储蓄倾向等于零,利润的储蓄倾向小于1(即不全用于储蓄),则经济增长率必须保持同利润率和利润的储蓄比率之乘积相等,才能使经济不断地稳定增长。

卡尔多的税收政策主张,也和他的收入分配理论有关联。1955年他发表《消费税》一书,主张从现行的按个人收入课税的制度改为按实际支出课税的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收入分配是不公平的,在税制上应让富者多付,贫者少付。他在两度担任工党政府财政大臣特别顾问期间,积极建议利用资本收益税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和利用有选择的就业税来鼓励劳工转移到制造业部门。

此外,卡尔多十分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问题,写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富有创见的论文和报告。这和他多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担任财政经济顾问的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

参考书目

A. S. Eichner and J. A. Kregel, *An Essay on Post-Keynesian Theory: A New Paradigm in Economic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3, pp. 1293—1314, 1975.

L. L. Pasinetti, *Rate of Profi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Relation to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XXIX, October 1962.

(宋则行)

kate'er

卡特尔 (cartel) 法语 cartel 的音译,原意是同盟或协定。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重要形式之一,由生产同类商品的资本主义大企业,通过签订某种协定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形成的一种垄断同盟。

种类 参加卡特尔的企业,一般都签订书面协议,但也有些卡特尔只作口头约定,没有正式文字手续。参加者推选代表组成委员会,其职责是监督协定的执行,并统一保管和使用卡特尔的共同基金。根据协定内容的不同,卡特尔有许多不同的种类,主要有:①规定产品价格的卡特尔。其参加者不得按低于卡特尔所规定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②规定销售范围的卡特尔。其参加者只能在规定的地区内销售自己的商品,不能进入其他参加者的销售地区。③规定产量的卡特尔。其参加者的商品生产和销售都有定额限制,超过者要罚款,未达到限额者则可从卡特尔取得相应的补偿。④分配利润的卡特尔。在这类卡特尔的参加者之间有着利润再分配的种种规定。例如,当某一成员接受一项定货任务时,必须把此事通知卡特尔的其他成员,然后再协商出哪一成员去完成该项任务,完成任务的成员把所得利润的一部分交给其他成员作为补偿。卡特尔一般都只包括上述内容中的一项,但也有同时包括几项内容的。卡特尔的参加者应按协议的规定办事,否则将受到制裁。卡特尔制裁其成员的办法通常有:罚款;撤销以专利形式颁发的许可证;拒绝从卡特尔所控制的共同基金中付给款项。

特点 ①参加卡特尔的企业虽然受到限制,但它们在生产上、商业上、法律上和财务上都是独立的。参加者当情况对他不利时,可以退出卡特尔。②由于上述的独立性,卡特尔是一种不稳定、不持久的垄断组织。当参加者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时,卡特尔往往宣告解散。但在新的力量对比基础上又可重组新的卡特尔。卡特尔协定的时间一般很难超过5年到10年。特别在经济危机时期,销售条件恶化,竞争更加激烈,参加者往往违反卡特尔的有关规定而各行其是,导致卡特尔在规定期限以前就失效了。③卡特尔的活动通常限于流通领域。

发展 卡特尔最初产生于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德国曾被称为“卡特尔”的国家。它从1857年出现第一个卡特尔起,到1905年,各生产部门共有385个卡特尔。据德国卡特尔运动理论家及领导人契尔斯基在1911年出版的《卡特尔和托拉斯》一书中估计,当时德国的卡特尔约有550~600个,遍及采煤、冶金、电气、化学、纺织、皮革、玻璃、砖瓦、陶器、食品等工业部门。因而卡特尔已成了德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1930年,德国钢铁卡特尔集中了德国钢铁销售总额的98%。德国之所以成为卡特尔的国家,同德国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德国存在着封建残余,工资水平较

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同时,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外市场的扩张方面遇到了激烈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为了获取垄断利润,为了联合起来对外扩张,通过缔结划分市场和规定销售价格的卡特尔便广泛发展起来。

在法国,1883年成立的制糖卡特尔,在该部门生产中占绝对垄断地位;20世纪初,在钢铁、棉花、煤、纸张以及玻璃行业中都建立了卡特尔。到30年代前后,法国工业中重要的卡特尔组织约有87个,其中重工业部门有64个,轻工业部门有16个。英国在1919年共有500个卡特尔,1944年增加到2500个。英国利华兄弟公司1901年与其他5大制皂公司组成卡特尔,控制了英国近2/3的肥皂生产。意大利的棉制品行业在20世纪初已有卡特尔。美国的卡特尔不多,因为反托拉斯法一般把卡特尔视作非法的,但按《韦布-波默林法》,对那些只是为了促进进出口贸易而组织的卡特尔则不加制止,因为这类卡特尔的成员能与其他国家的卡特尔成员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卡特尔的组织形式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组织仍然广泛存在着。在70年代中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出口卡特尔的数量是:日本214个、英国89个、联邦德国81个、美国35个、荷兰60个,每个卡特尔都由几家或几十家公司组成。如美国纸张卡特尔包括17家公司,面粉和胶合板卡特尔有20家公司,纺织品卡特尔有24家公司。日本型钢卡特尔包括44家公司,燃料卡特尔有60家公司,棉纺卡特尔有74家公司。联邦德国的化纤卡特尔包括34家公司,陶器卡特尔有204家公司。

战后日本的卡特尔,从形式上看,有“合法”卡特尔和以“君子协定”形式出现的“地下”卡特尔之分。在60年代,几乎每年都有1000个左右的“合法”卡特尔在活动。这类卡特尔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以限制产量或对外倾销的办法,维持垄断价格。1970年爆发经济危机后,一些垄断资本家又纷纷组织反萧条卡特尔。例如,由于钢铁生产严重过剩,价格猛跌,为了“稳定价格”,新日本制铁,日本钢管、住友金属工业、川崎制铁、神户制钢以及日本制钢六大钢铁公司便于1971年12月成立了“粗钢反萧条卡特尔”。至于“地下”卡特尔,它们主要是在集中程度更高的商品或行业中活动,但它们的行动诡秘,外界很难知其内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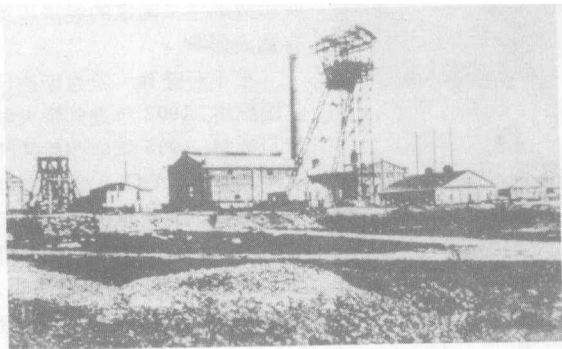
(肖德周)

Kailuan Meikuang

开滦煤矿 中国近代最大的煤矿之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产物。亦称开滦矿务总局。

开滦煤矿前身开平矿务局,是李鸿章于1877年命唐廷枢筹办的一个煤矿。开办资本80万两,官督商办。1878年10月开始钻探工作,第二年2月开始第一号矿井的凿掘工程,1881年出煤。该矿煤藏丰富,地理条件优越,生

产蒸蒸日上。据1889~1899年该局帐略统计,11年共盈利900余万两。由于该矿经营卓有成效,引起了帝国主义垂涎。1898年英商C. A. 墨林勾结该矿督办张翼的顾问德璀琳(1842~1913,德人,天津海关税务司),通过借款,打入开平;接着密谋策划把该矿变成中外合资公司,引进英国和以比利时为代表的国际财团资本。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英国资本家趁八国联军入侵之机采用阴谋手段,威逼利诱,无代价地骗取了开平。



开滦煤矿马家沟矿

开平矿被英人骗占后,袁世凯(1859~1916)三次参奏张翼,清政府责令张翼收回开平。张翼在伦敦起诉,都以无结果而告终。袁世凯又于1906年命周学熙创办滦州煤矿,用实力进行抵制,企图达到以滦收开的目的。滦州矿初定资本200万两,生产发展迅速,1908年出煤1.2万余吨,到1910年达到35.7万余吨。滦州矿的成立,对开平矿造成了直接威胁。开平矿英人在英政府和国际财团的支持下,以政治和经济手段压迫滦州矿,使该矿难以维持。1912年1月双方达成协议,签订了“联合办理草合同”,成立了开滦矿务总局。1912年6月袁世凯政府批准了“联合办理正合同”。合同规定双方资本各为100万磅,但由于经营管理权掌握在英人手中,因此所谓联合,实质是兼并。

开滦煤矿成立后,产量迅速增长,盈利日益丰厚。据统计,煤产量从1912~1913年的169万余吨,增加到1931~1932年的526万余吨,19年间,产量增加2.1倍。年利润额同期增加2.5倍。这种情况,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开滦煤矿的觊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开滦煤矿终于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将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接收的开滦资产,发还给开滦矿务总局,英人再度控制了开滦煤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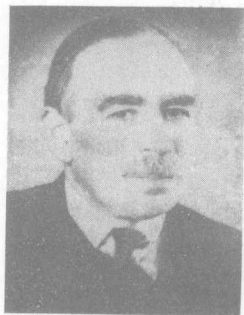
英人1945年接管开滦后,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厂矿设备受到破坏;而接管后的煤矿机构庞大,人员臃肿,产销每况愈下,年有亏损。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唐山地区,人民政府派军代表协助开滦组织生产,收购滦煤,保障职工生活,但开滦还是赔累甚巨。在此困境下,开滦英籍总经理裴利耶拐款逃英。1951年,裴利耶要求撤销其英方总经理职务。

1952年4月6日开滦华籍总经理余明德以该矿“经

济困难达于极点”为由书面申请人民政府代管。1952年5月7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接受了余的请求,由人民政府接管了该矿。(阎光华)

Kai'ensi

凯恩斯, J. M.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20世纪上半期英国经济学家。他的经济思想



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有重大影响。

生平 and 著作 凯恩斯生于英国剑桥,1902年进剑桥大学学习数学,1905年毕业后又师从A.马歇尔、A.C.庇古学习经济学一年。1906年进英政府印度事务部任职,1909年任剑桥国王学院研究员,讲授经济学。

在此前后,他以大部分精力研究概率理论,1921年出版《概率论》一书。

他在经济方面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是《印度的通货与金融》(1913),鼓吹用金汇兑本位制把印度货币与英镑联系起来,稳定印度经济,以利英国对印度的统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凯恩斯进英国财政部任职。在大战后期,他是该部外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在巴黎和会上,是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后因反对向德国索取过重的赔款而辞职,回剑桥执教。1919年他发表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是他早期的成名之作,在该书中他抨击巴黎和会向德国索取过重赔款的计划只能导致德国的垮台;认为恢复德国是反对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一支“真正力量”。当时列宁指出,凯恩斯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坚决卫士,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列宁选集》第4卷,第322页)。

凯恩斯回剑桥执教后,从事战后货币问题的研究。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以货币数量说为基础,说明物价水平的变动,反对通货紧缩,反对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主张用管理通货来稳定物价与生产。1925年英国按战前的英镑金平价回复到金本位,对此,凯恩斯写了不少批评文章,认为英国经济困境的根源是英镑估价过高,这使英国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

20年代英国经济陷于长期萧条,失业问题十分严重。凯恩斯逐渐察觉单纯依靠资本主义的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已不足以解决它所面临的困境,1926年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提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明智管理的必要性,开始从自由放任主义的传统观点转向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1929年他支持英国自由党领袖D.劳合·乔治(1863~1945),提出举办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的方案,他与另一经济学家H.D.亨德森(1890~1952)合写小册子《劳合·乔治能胜任吗?对自由党誓言的审查》,力图说明公共工程可以增加就业的作用。这一时期,凯恩斯尽管提

出了依靠国家干预经济以摆脱失业和萧条的政策建议,但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加以论证。他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两卷,虽然又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但还没有触及就业水平的决定问题。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任关于金融与工业的麦克米伦委员会委员,1930年又任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1931年6月发表的“麦克米伦报告”所提出的应付危机的办法,如反对降低工资,建议降低英镑的金平价,控制进口,帮助出口,支持公共投资,鼓励私人投资等,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凯恩斯的主张。此后几年,他集中精力写作一生最有影响的一本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于1936年出版。该书引起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轰动,把该书的出版称为“凯恩斯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凯恩斯写了一本著名小册子《如何筹措战费》。J.M.凯恩斯为财政大臣提出的基本计划(1940),为英国战时财政出谋划策。随后他重返财政部,任该部咨询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为战时大量的财政问题提供对策。1941年起兼任英格蘭银行董事。1942年晋封为勋爵。大战期间,积极参与筹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工作。1944年,率领英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后,他任这两个国际组织的董事。但这两个组织主要是按照当时美国的利益建立的,代表英国愿望的凯恩斯的主张,没有完全得到实现。1945年秋,他作为英国首席代表参加向美国借款的谈判。1946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的第一次会议上,他与美国代表发生尖锐冲突,回英后不久因心脏病猝发去世。

凯恩斯生前除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著述并参与英国政府的经济决策外,还曾从事金融投资活动。1921~1938年任国民互助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他也曾积极从事报刊编辑工作,1923~1929年间任《民族周刊》董事长,并经常为之撰稿。1911年起,他长期担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所办的《经济学杂志》主编,直至1945年。

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 在凯恩斯的学生时代以至30年代初,在英国经济学界,特别是在剑桥大学,占统治地位的是马歇尔的经济理论。马歇尔继承英国从古典到庸俗的经济传统,兼收并蓄,把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供求论、边际生产力论、货币数量说等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折衷主义的、集庸俗经济学大成的理论体系。凯恩斯是在马歇尔的直接熏陶下成长的,他接受马歇尔的理論体系,力图把它运用到货币领域中去。他在《印度的通货与金融》中,建议印度设立中央银行,集中黄金准备,采用金汇兑本位制,认为这比实行严格的金本位制更能稳定印度的货币。表面上看,这个建议有些偏离正统,但实际上它完全是从传统的理论,特别是从货币数量说中推演而得的结论。他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中,以沉重的怀旧心情回顾了战前的经济制度,他和其他正统派的庸俗经济学家一样,把战前时期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黄金

时代。

但是战后英国经济的长期萧条和严重失业,促使凯恩斯考虑如何解决经济失调的对策。开始时,他只是在货币领域里打圈。在20年代,他坚持稳定物价,把物价稳定看作是防止经济波动的前提,并把战后的经济灾难归诸于通货紧缩。他在《货币改革论》中提出实行通货管理以稳定物价,反对恢复金本位制,这和当时一些正统派经济学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但是这个拟议的措施,仍然以传统的货币数量说为基础,他在该书中提出的货币数量方程式,则是从马歇尔表述的“剑桥方程式”演化而来。至于当时存在的严重失业问题,他也认为可以利用适当的货币政策加以解决。他在《货币论》一书中的主旨,仍然是为了论述维持物价稳定的途径,但凯恩斯企图通过投资、储蓄、利率三者的关系加以说明。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是由投资率的波动引起的,而投资率的波动是与利率相联系的。他把储蓄和投资相等时的利率称为自然利率。当市场利率偏离自然利率时,投资就会波动,引起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异,而物价的波动正是储蓄和投资发生差异的结果。要维持物价的稳定,就要维持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均衡;而使后者均衡,就须使市场利率符合自然利率。为此,他建议实行通货管理,由中央银行操纵利率,使投资率趋于稳定并与储蓄率相均衡,以达到物价稳定的目的。《货币论》之比《货币改革论》前进了一步,在于他力图摆脱传统的货币数量说。但是,这时他还没有把储蓄和投资同就业水平的决定联系起来,仍然假定产量、就业量为既定,这说明至此凯恩斯尚未跳出传统经济理论的框框。

但在1929年,凯恩斯竭力支持乔治提出的举办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的方案,认为公共工程开支不仅可以直接增加就业,而且可以通过工程雇用人员收入的增加,间接增加其他工业部门的就业,这是他后来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思想发展的萌芽,是他开始摒弃某些正统观点的发端。只是由于这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他对自己的见解的论辩,是软弱无力的。

30年代初英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萧条和失业,更趋严重。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传统庸俗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新的辩护理论来代替它,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克服萧条和失业的对策。这就是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背景。《通论》抨击“供自己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提出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用有效需求不足解释失业和萧条。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和货币供应量决定:①“消费倾向”(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决定消费支出;②“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决定“资本边际效率”(即预期利润率),后者与利率一起决定投资支出,增加投资,通过“乘数”作用,可以引起几倍于投资量的国民收入的增加;③“流动偏好”,决定对货币的需求量,后者和中央银

行控制的货币供应量一起决定利率。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心理因素相互作用造成有效需求的不足,而危机的爆发则主要由于对投资的未来收益缺乏信心,引起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的结果。凯恩斯以这个理论为依据,提出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措施,增加公共支出,降低利率,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在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下,纷纷宣告以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目标。凯恩斯主义成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最大以至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事实上,战后依据凯恩斯理论采行的政策措施,虽然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失业,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但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的失灵,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加深。

参考书目

A. 罗宾逊著,滕茂桐译:《凯恩斯传》,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A. Robinson,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in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47.)

L. R. 克莱因著,薛蓓康译:《凯恩斯革命》,商务印书馆,北京,1962。(L. R. Klein,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Macmillan & Co. Ltd., London, 1950.)

D. Worswick and J. Trevithick ed., *Keynes and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3.

(宋则行)

kangcai'en

康采恩 (concern) 德语 Konzern 的音译,原意为多种企业集团。这是一种规模庞大而复杂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式。由不同经济部门的许多企业联合组成,是金融寡头实现其经济上的统治的最高组织形式。金融寡头通过大银行或大工业企业,采用参与制掌握股票控制额,使其他参与者从属于自己,从而得以控制比其本身资本大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资本以加强垄断统治,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与托拉斯的区别 在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康采恩同以金融控制为基础的那一类托拉斯之间不易划出明确界限。一般说来,二者的区别主要是:①从结合形式看,参加托拉斯的各个企业事实上已溶合为一体,完全丧失了各自的独立性;而加入康采恩的各个企业在形式上是独立的,尽管其中的大多数要受居于核心地位的大银行或大工业企业的直接控制。②从参加的主体看,加入托拉斯的都是单个资本家的企业,而加入康采恩的既有单个资本家的企业,又有集团资本家的垄断企业如卡特尔、托拉斯。③从参加者从事的业务看,加入托拉斯的一般多是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或在生产上有密切联系的企业,而参加康采恩的企业,既有工业、矿业和交通运输等生产性企业,又有银行、保险公司、商业公司及其他服务

性公司等非生产性企业。

发展沿革 康采恩是由大财团控制的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它出现的历史比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稍晚,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先后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美国的第一批财团是以家庭为中心组成的。由于它们位于东部地区,通常被称为东部财团。其中,除实力最大、以钢铁起家的摩根财团和以石油起家的洛克菲勒财团外,还有梅隆以及杜邦等财团(见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财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约有20个大财团(见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财团),其中实力最雄厚的金融资本集团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团。这些大财团的势力控制着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集中地体现了金融寡头的全面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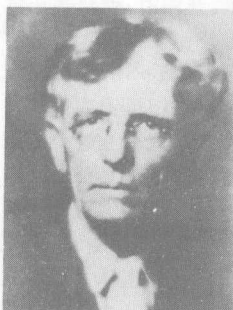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康采恩继续有所发展和变化,主要是:①各国金融资本集团的实力迅猛膨胀。如美国八大财团1974年控制的资产总额高达11860亿美元,比战前1935年当时八大财团所控制的资产额增加了18倍多。由于财团实力的膨胀,它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程度进一步加强,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②财团组成的成员发生了变化。战前的财团家族色彩浓厚,有许多财团由单一的家族成员组成。战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美国,有的财团已由单个家族的控制变为多家族控制,有的财团原来的家族名称只是一个象征,实际上早已成为以大银行为中心的财团了。③财团之间相互渗透,其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是相互购买对方股票、相互在对方企业中投资、相互发生信贷关系,因而现在的财团势力范围已很难划分得那么清楚。④财团同国家政权的结合更加密切。金融寡头亲自出马,或者派遣代理人到政府中担任要职,直接掌握国家机器来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此外,财团通过自己设立的各种机构对政府施加影响,左右政府的内外政策,也比战前大大加强。⑥财团的多样化经营和国际化进一步发展。现在的许多财团,其经营包括各行各业,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财团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它们的势力不断伸向国外。各国财团还互相渗透,或者联合起来共同对第三者进行控制。

(肖德周)

Kangmengsi

康蒙斯, J. R. (John Rogers Commons 1862~1945) 美国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出生于俄亥俄州霍兰兹堡。1888年毕业于奥伯林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892年,任该学院经济学、社会学教授,1915年在该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1901~1902年,任美国工业委员会研究员。1904~1932年任威斯康星大学教授。1920~1928年任全国经济研究局局长。主要著作有《财富的分配》(1893)、《工联主义和劳工问题》(1905)、《劳工与管理》(1913)、《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制度经济学:它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1934)等。

康蒙斯把制度看成是人类社会经济的推动力量。他所说的制度,是指约束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而言,而在集体行动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他认为,法律制度不仅先于经济制度而存在,并且对经济制度的演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例,首先是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胜利,使封建经济制度解体,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最终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得以确立。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以后,法律制度仍然推动着经济的发展。例如,在美国建国后的最初50年内,公司是垄断性的组织,只有得到立法方面的特许权的公司才能进行活动,但这就造成了贪污行为。后来,制定了一般的公司法,使任何合于规定的公司组织都能得到承认,于是公司普遍化了,公司不再是垄断性的组织,而成为竞争性的组织。公司法确立了商人的组织经营的权利。这样,资本主义就进入了新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加快了。



康蒙斯以法律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经济关系。他认为,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交易,整个社会是由无数种交易所组成的一种有机的组织。由于参加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在交易过程中将会有双方的利益冲突。法律制度的任务在于调节这些利益的冲突,充当双方利益的公正的仲裁人。而人们之所以会接受法律制度,承认法律的仲裁,就在于交易双方除了在利益上有彼此冲突的一面外,还有相互依赖的另一面。正是这种相互依赖性,使社会得以继续存在,使法律得到尊重,使经济得以发展。

因此,康蒙斯主张完善法律制度,确立可以保障劳动者的法律制度,并运用法律制度来管理美国经济。康蒙斯的这种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反映了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他不仅把国家和法律看成是超阶级的,而且认为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冲突并不具有阶级之间对抗的性质,而只不过是交易双方在利益上的不协调。他认为,由于劳资双方还有相互依赖的一面,所以他们仍有可能在资产阶级政府和法律的调节下达成协议。

参考书目

L. G. Harter, John R. Commons: *His Assault on Laissez-faire*,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orvallis, 1962.

(厉以宁)

Kang Youwei

康有为 (1858~1927)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理论家。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1895年,联合赴京会试举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1898年,依靠光绪皇帝的支持进行变法,史称“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幻想扶持光

绪重新掌权,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后,在政治上要求复辟帝制,在思想上宣扬尊孔复古。其影响较大的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以及向光绪皇帝的历次上书等。同经济思想有关的还有他后期著作《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议》、《理财救国论》等。



早期的经济思想 在19世纪末,康有为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他主张以大工业为中心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公车上书”中,他提出了以“钞法”、“铁路”、“机器轮船”、“开矿”、“铸银”、“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等为内容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戊戌变法时期他又进一步指出:“今已入工业之世界”,中国要富强,必须“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成大工厂以兴实业”(《请厉工艺奖创新折》),明确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张和振兴实业的口号。

他彻底否定了洋务派办工业的道路。他指出,洋务派垄断新式工业的“官办”和“官督商办”,“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主张除发行货币和邮政事业仍由国家统一经营外,其余工、矿、商、交通运输各业,包括军事工业,都应该“一付于民”、“纵民为之”(《上清帝第二书》),听任私人资本家投资经营。国家要在培养人材、供给技术资料、减轻捐税、颁发专利执照等方面,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康有为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改革封建的上层建筑。他抛弃了早期改良派“可变者器,不可变者道”的观点,认为只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是“变事”不是“变法”,“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即在政治上也要尽变西法。他建议设“制度局”以代替封建中央权力机构“军机处”,他所设计的制度局,实际上是一个由主张变法的势力掌权的维新内阁。

康有为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危害。他在《大同书》中,在坚持资本主义纲领的同时,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大同”思想。在他理想的“大同”社会里,没有私有制,土地及其他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公有。农、工、商各业都由“公政府”按照社会需要实行有计划的经营。“大同”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达,工作日大大缩短,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享受极大提高。“大同”社会将消除国家,消除种族差别,消灭家庭,男女完全平等。“大同”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和等级工资制,还存在商品和货币,并有商业大富人和各业大富人。

后期的经济思想 20世纪初期,面对着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康有为坚持改良、保皇的立场,经济思想由进步转向反动。他在1905年写的《物质救国论》

中,否定了自己过去的进步思想和活动,宣称“中国近数十年变法者皆误行”,忏悔自己领导变法维新运动是罪魁祸首。在经济思想上,他也倒回到洋务派的船坚炮利论。认为唯有讲求物质,讲求“工艺炮舰”,才能救国。他在辛亥革命前夕写的《金主币救国议》,把中国贫穷衰弱完全归因于没有实行金本位的货币制度,把货币制度的改革说成是中国起死救亡的“第一方”。辛亥革命后,他又写了《理财救国论》,宣扬只要建立起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银行网,中国就可以“十年而富力无敌于天下”。他还针对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极力鼓吹土地投机。1919年康有为重印《物质救国论》时,在该书《后序》中攻击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未至其时而误行之,徒足以招乱”,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张守军)

Kang Ri Shiqi de Jingji Wenti he Caizheng Wenti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Economic and Financial Problems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毛泽东论述经济和财政的关系,以及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著作。1942年12月,毛泽东以《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为题,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报告。本文是报告中的第一个问题,原是《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在编入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改为今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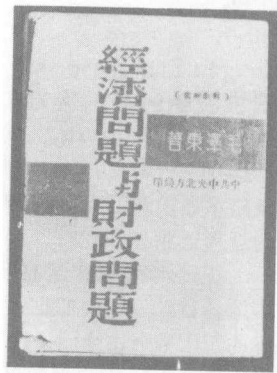
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上遇到极大困难。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军队、机关干部和学校人员,缺少最必需的生活用品。毛泽东为了给解决财政困难指明前途,作了这篇报告。

本文论述了十个问题。

文中着重阐明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应遵循的原则和应发展的各项生产事业。

发展经济,才能解决财政困难 毛泽东指出,为了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有些同志企图缩小必不可少的开支。他们不理解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财政工作固然很重要,但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为了发展经济,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发展了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业和工业;几万机关和学校人员,发展了同样的自给性经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帮助群众发展经济 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多负担一些经费是应该的,也得到了人



中共中央北方局印发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封面

民的谅解。但必须使人民的经济有所增长,使人民的生产有所发展,也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要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帮助人民发展经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人民的收入,使人民所得大于所失。

在公私关系上,毛泽东认为,应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向人民征收抗日经费,既不能不顾战争的需要,片面强调政府应施“仁政”;又不能不顾人民的困难,竭泽而渔。

精兵简政 在陕甘宁边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都实行了“精兵简政”。按照“精兵简政”工作的要求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精简,就是减去不必要的机构和人员;统一,就是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够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效能,就是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就是节省一切不必要的支出。在经济和财政工作中,还要求克服官僚主义,反对贪污现象。

在本文所阐述的理论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发展,克服了当时在财政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提高了军队、机关、团体、学校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从物质上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宋 涛)

Kang Ri Zhanzheng shiqi de houfang gongye

抗日战争时期的后方工业 (industry in the rear are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指 1937~1945 年间未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川、滇、黔、桂、陕、甘、宁、青、湘(西部)等省的近代工业。

抗日战争前,中国的近代工业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地各省几无近代工业可言,川、湘、桂、陕、黔、滇、甘七省的工厂数只占全国工厂总数的 6%,资本额占 4%,工人人数占 7%,发电度数仅及全国总数的 2%。

工厂内迁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通过工厂内迁的提案。部分民营工厂为了避免日本侵略军侵占,也着手迁到后方去开业。但由于缺乏准备,政府又无统一计划,加以运输工具严重缺乏,沿途并遭军警扣截和敌机轰炸等,迁移工作十分艰难。从 1938 年到 1942 年底内迁厂矿共计 639 家,器材 12 万多吨,技工 1.2 万余人;以机器、纺织为主,这些内迁工厂是促进后方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后方工业的发展 战时外地货物输入困难,沿海地区人口大量迁居内地,对工业品需要量增多,加之抗日战争初期物价上涨幅度还不小,生产还较稳定,后方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1937~1944 年共开办各类工厂 4 966 家,登记资本折合战前币值约 36 953 万元。重要工矿产品的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见表)。

根据战时 28 种主要工矿产品的产量,按战前 1933 年不变价格折算的产值,1938 年为 10 931 万元,1940 年

抗日战争时期后方重要工矿产品产量

产品	单位	1938	1940	1942	1944	1945
电力	千度	73 622	111 931	136 850	174 220	196 695
煤	千吨	4 700	5 700	6 314	5 502	5 238
石油	吨	75	1 662	60 888	75 723	72 336
生铁	吨	52 900	45 000	96 000	40 134	48 495
钢	吨	900	1 500	3 000	13 361	18 234
工具机	部	332	1 024	1 147	1 350	775
水泥	桶	21 498	50 479	39 843	40 655	42 229
酸	吨	272	595	1 006	1 193	599
碱	吨	520	1 486	2 263	6 101	3 342
酒精	千加仑	304	4 590	7 885	7 346	16 221
机制纸	吨	492	660	4 250	3 669	3 900
面粉	千袋	1 513	3 239	4 880	2 881	2 056
机纱	件	24 515	29 518	114 100	115 000	69 200

增为 15 796 万元,1942 年又增到 23 332 万元,1943 年则降为 22 318 万元,1944 和 1945 年继续下降。

后方工业的特点 战时后方工业的最大特点是重工业的比重增加。战前内地可以说没有重工业,战时为适应战争需要,并因进口受阻,重工业部门得到了迅速发展。冶炼、机器、五金、电器、酸碱、酒精(代汽油用)各项的资本额占到后方加工工业资本总额的 70%,这些企业的工人人数占工人总数的 55%。

后方工业的另一特点是国家垄断资本占优势。战前除军需、铁路等外,国民党政府少有余资举办工业。而战时政府经营的工业到 1942 年,厂数虽不及 20%,但其资本在后方工业资本总额中所占比例已近 70%,特别在水电、冶炼、机械、电器和化学等基本工业中均占绝对优势(占 73~90%),纺织和建材工业也与民营企业基本相当(均占 49%)。石油及钨、锡、汞等全部为政府经营,1942 年以后,占有生铁产量的 50% 以上,钢产量的 90% 以上。

后方工业的衰落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战时经济统制失策,各级官僚机构行政混乱,以及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企业资金周转不灵,加上滇缅路运输中断,原材料、器材供应不足,工业生产日趋困难。1942 年以后发展停滞,新厂设立逐年减少,旧厂出顶、改组、减产、停工者日多,并出现从事商业投机“以商养工”的现象。国民党政府经营的工业也陷于困境,1943 年国民党政府经营的铁和钢产量只及其生产能力的 37% 和 11%。

战时后方工业的短暂发展,对改变内地经济的落后面貌和供应战时军民需要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基础薄弱,国民党政府又无长期的经济发展政策,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政治、经济中心东迁,后方工业也随之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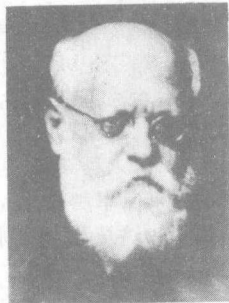
(朱秀琴)

Kaociji

考茨基, K. (Karl Kautsky 1854~1938)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 and 理论家。他早期

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期成为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1854



年10月16日生于布拉格(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75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80年迁居苏黎世，开始从事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并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1883年创办《新时代》杂志。1885~1890年侨居伦敦。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回到德国，曾参加起草德

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E.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公开攻击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时，考茨基起初表现动摇，后来在广大党员的压力下才发表文章批判伯恩斯坦。他在1899年出版的《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一书在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这本书中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对机会主义作了让步。在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围绕米勒兰事件展开的争论中，采取了妥协和调和的立场。从1910年起公开转向中派主义，标榜在右派和左派之间不偏不倚，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饰他的机会主义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参加创建中派主义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俄国十月革命后，竭力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反对苏维埃政权。在德国十一月革命期间，曾短期在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组成的临时政府中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后来又担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1921年支持中派分子组成第二国际。1924年迁居维也纳，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占奥地利后，先逃往布拉格，后又移居荷兰，同年10月17日死于阿姆斯特丹。

考茨基在他活动的初期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一书中通俗地解释了《资本论》的内容。恩格斯审阅了这本书的草稿，认为它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叙述“尽管不总是十分准确，但是还不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9页)。他在《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1899)一书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驳斥了机会主义者鼓吹的“小农经济稳固论”，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不能剥夺农民，而应通过合作制把农民组织起来，朝社会主义大农业方向发展。列宁曾给予此书肯定的评价。考茨基还整理和编辑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手稿，在1905~1910年以《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名称分三卷出版。

但在后来，考茨基转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竭力抹煞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把帝国主义解释成只是一种特殊的政策，即高度发达的工业国想要统治农业区域的倾向。他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割裂开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替社会沙文主义制造理论根

据，考茨基提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超帝国主义”论。他断言，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似乎可以通过各国资本家互相协商的办法，使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起来，建立起一种有组织的世界经济体系，从而可能出现一个把卡特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即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阶段。到了那时，帝国主义不仅消除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危机，而且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动战争的危险也不存在了。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指出，考茨基实际上是要用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幻想来欺骗群众，巧妙地宣传同帝国主义妥协。

俄国十月革命后，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1918)等小册子中鼓吹“纯粹民主”，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在《历史唯物主义》(1927)一书中宣扬社会主义似乎是社会生产力机械发展的结果。他断言，一个国家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时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俄国经济落后，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起点。他攻击十月革命是一种想要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大规模试验，号召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李兴耕)

Kaofu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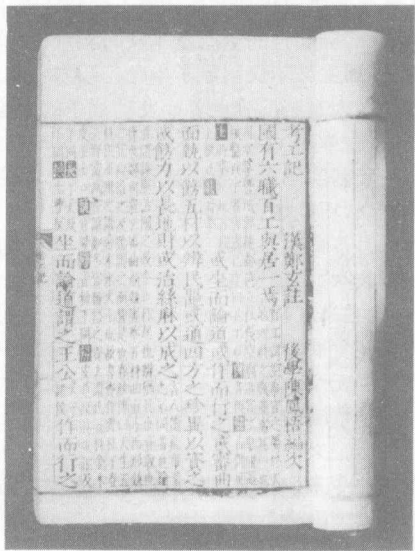
考夫曼, И.И. (Илларион Игнатьевич Кауфман 1848~1916) 俄国经济学家。他曾写过一些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在1867年出版后，1872年即出版了俄文译本，1872年考夫曼在《欧洲通报》第3卷上发表了题为《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的短评。他在这篇文章中谈到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时说：“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他又说，马克思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考夫曼的这篇论文受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好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在援引考夫曼的一段较长的原文后说：“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页)。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指出：“这篇文章颇为有名，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引用伊·考一曼的论点，认为他正确地论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列宁全集》第21卷，第71页)。

然而，考夫曼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整个方法，因为他称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唯物的，但叙述方法是唯心的。他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与G.W.F.黑格尔(1770~1831)的唯心辩证法混为一谈。(刘 焱)

Kao Gongji

《考工记》 中国春秋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西汉初期因《周礼·冬官》散失，遂以《考工记》作补，从而保存在《周礼》中传世。



《考工记》(明嘉靖六年刻本)

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 《考工记》十分重视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进，体现了它重视发展生产力的思想。耨是锄田器，是春秋时期一种重要的农具。斧、斤、凿、曲刀、量器等则是手工业生产不可少的工具。《考工记》从青铜手工业的冶铸技术角度对这类器具的制作工艺进行了总结，“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凫氏为声，栗氏为量，段氏为铸器，桃氏为刃”。“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指出“斧斤之齐”和包括铸器在内的生产工具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五比一。车辆在春秋时期不仅是重要的战争工具，也是常见的交通运输工具。《考工记》对车的制作甚为重视，它提出只有把车轮制成正圆，才能使轮与地面的接触面“微至”，从而减小阻力以保证车辆行驶“减速”。它还规定制造行平地的“大车”和行山地的“柏车”的毂长（两轮间横木长度）和辐长（连接轴心和轮圈的木条长度），各有一定尺寸，说“行泽者欲短毂，行山者欲长毂。短毂则利，长毂则安”。这种工艺也是按照不同地势条件以求达到较大的行驶效率。《考工记》还十分重视水利灌溉工程的规划和兴修，它记述了包括“浚”（大沟）、“洫”（中沟）、“遂”（小沟）和“阡”（田间小沟）在内的当时的沟渠系统，并指出要因地势水势修筑沟渠堤防，或使水畅流，或使水蓄积以便利用。对于堤防的工程要求和建筑堤防的施工经验，它也作了详细的记述。

重视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 《考工记》将制作精工产品规定为手工业生产的目标，而将天时、地气、材美和工巧以及四者的结合，看作必备的条件和重要的生产方法。它认为天时节令的变化会影响原材料的质量，进而影响制成品的质量，所以强调“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

它重视地气，是由于某些地方生产的某种原材料质量较优，或者有制造某种工艺的优良传统。它说，“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不能为良，地气然也”。至于工巧，它认为是与分工有关。《考工记》所记述的手工业，分工细密，攻木之工有七种，攻金之工有六种，攻皮之工有五种，设色之工有五种，刮摩之工（玉石之工）有五种，搏埴之工（陶工）有二种。分工细密，人尽其能，则有助于工匠技艺专精。它对“工”的见解非常卓越。它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这是对不断创新，提高工效，保持优良传统工艺的歌颂。

在生产经营上，为了使制成品合乎规格，保证良好的效益，需设工师专管。《考工记》对此也作了记述，“凡试梓饮器，乡衡而实不尽，梓师罪之”，这是说工师检验梓人所制的饮器，如平爵向口，爵中还留有余沥，便不合标准，梓人就要受到处罚。《考工记》还指出在市场上用于交换的手工业制品，必须符合规格，为买者乐于接受，残次品不能上市。

为了提高效益，必须精于算计。《考工记》以修筑沟防为例，提出“凡沟防，必一日先深之以为式，里为式，然后可以傅众力”。就是说，在沟防修筑中，应以劳工一天完成的进度作标准，以完成一里地的劳力和日数来计算整个工程所需的人力。

言官府工业而不非议民间工业 《考工记》开宗明义就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这一方面是说“百工”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百工”是属于官府手工业。郑玄注说，“百工司空事官之属”，“监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虽然《考工记》所记都是官工，但它说有些诸侯国对于有些产品，并没有设官制造。它指出其原因是：“粤（越）之无铸也，非无铸也，夫人而能为铸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这是说，这些诸侯国和有的地区，或由于山出铜锡，或由于地处边区，所以民间都能制造这些产品，而不必专门设官制造。《考工记》对于民间手工业的肯定态度是与春秋时期的社会改革相一致的，也与它认为“工”是“知者创物”等的见解相符合。

（厉以平）

Ke'erbel'er

柯尔贝尔，J.-B. (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 法国晚期重商主义者。出生于一个呢绒商家庭。1649年在战事办事处任秘书。后又在 G. R. 马扎里尼(1602~1661)红衣主教手下工作。1661年被路易十四任命为财政大臣，后又兼任了海军大臣。他在执掌财政的20年期间，推行了一套重商主义的财政经济政策，所以，17世纪下半期法国的重商主义也被称为柯尔贝尔主义。

同英国晚期重商主义者一样，柯尔贝尔也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能增加一国的国民财富。他认为，除非同时把邻国的白银减去相等的数量，法国才能增加白银。为了

增加法国的金银财富,他力图通过对外贸易的顺差来达到这一目的。

为了发展对外贸易,柯尔贝尔积极推行鼓励工场手工业发展的政策。他利用国家财力创办了皇家工场手工业,大力扶植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以各种优惠条件特别奖励奢侈品工业的发展。在柯尔贝尔当政时期,工场手工业出口产量激增,法国成为欧洲许多国家奢侈品的主要供应国,使大量贵金属流入法国。



柯尔贝尔把国内贸易看作是对外贸易的辅助力量,大力加以改进。他取消了部分国内税卡,统一了税率。为便利商品运输,建造公路桥梁、开凿运河、整修航道。这些措施促进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

柯尔贝尔采取保护关税政策。他一方面鼓励本国商品出口,同时限制外国商品进口。但对本国工场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进口不加限制,并且采用低税率征税。

柯尔贝尔还在国外加强经济扩张和殖民地掠夺。法国先后在海外创办许多垄断性贸易公司,如仿效荷兰创设东印度公司,还设立西印度公司以及其他商业公司以开辟海外市场,扩大法国商品出口;同时建立了庞大的海军舰队和商船队,以增加法国海上的威力,保护法国对外贸易;此外,还推行殖民政策,在美洲、非洲等地区掠夺了大片殖民地。在柯尔贝尔执政期间,法国成为一个远洋贸易和殖民掠夺帝国。

柯尔贝尔虽然也采取一些奖励农业的措施,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工业提供原料与粮食。他为了满足路易十四的宫廷开支和战争费用,为了促进工商业发展和争夺国际市场,强行征收各种赋税,并禁止农产品输出和允许外国农产品输入法国,严重地损害了法国广大农民的利益,导致农业衰落,使法国经济和财政陷入严重危机。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政策遭到法国古典经济学家的严厉批判。路易十四死后,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政策便完全崩溃。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也从重商主义向古典政治经济学过渡。

参考书目

G. von Schmoller, *The Mercantile Syste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Peter Smith, New York, 1931.

E. F. Heckscher, *Mercantilism*, rev. ed., Allen & Unwin, London, 1955.

(李宗正)

Ke'erbel'er zhongshangzhuyi zhengce

柯尔贝尔重商主义政策 (Colbert's mercantilist policy) 法国重商主义者J.-B.柯尔贝尔在17世纪60~80年代初所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

重商主义是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16~17世纪时曾经

普遍流行于西欧各国,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法国早在亨利四世在位期间(1589~1610)即已开始实行。1643年路易十四即位,当时法国正面临着国家财政混乱、工商业凋敝的严重局面。柯尔贝尔担任国家大臣期间(1661~1683),为了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使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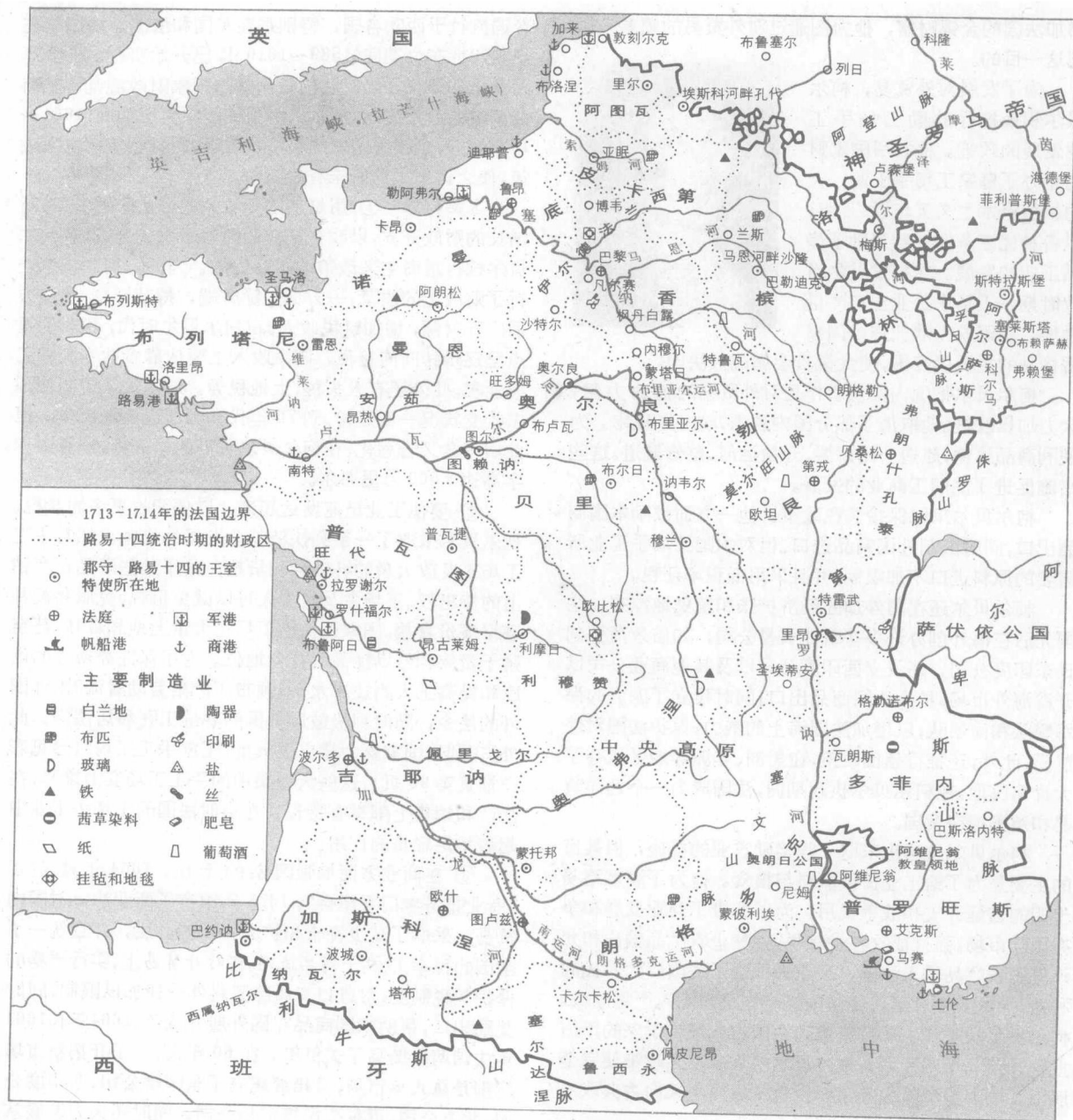
主要内容 ① 用增加国库收入的办法来解决不断增长的财政开支,以改善国家的财政困窘状况。这是柯尔贝尔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首要目的。为此,柯尔贝尔进行了财政上的改革,一方面剔除弊端,撙节开支;另一方面广开财源,增加赋税收入。在柯尔贝尔时代,税收的重点已逐步转向间接税,国家收入主要依靠食盐专利和工商业税,此外还有人头税、土地税等。财政改革曾经使国家收支状况一度好转,到70年代初国债已逐渐减少。但此后不久又告恶化。在柯尔贝尔去世的那一年,预算中赤字高达3500万里弗尔。

② 要使工业迅速发达起来,以便征收更多的赋税。柯尔贝尔采取了一系列扶植工业发展的措施:如对手工场主发放大量的补助金和贷款,给予某些产品在产销上的特惠权。工场主及其工人可以减免租税、免服兵役并获得廉价食盐。国家还拨给工场主大量土地和森林,甚至赠予贵族称号以提高其社会地位。为了保证劳动力的供应和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颁布了严禁劳动者流出到国外的法令,同时积极鼓励外国的熟练工匠移居法国。此外,还利用国家财力建立了大批“王家手工工场”(参见彩图插页第96页),这些大型集中的手工工场实力雄厚,在生产和销售上都享有特权,在当时法国的工场手工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③ 在商业方面加强国家的干预。1664年建立了“商业事务专门委员会”,1673年颁布了商业法,对国内贸易,采取了减少税卡和扩大税区的办法,并且统一了全国的税率,以利于商品流通。在对外贸易上,实行严格的保护关税制度,对进口商品除原料外一律加以限制,同时奖励出口,帮助本国商品在国外展开竞争。1664年和1667年法国两次提高了关税税率。在60年代,为了开拓新市场特别是殖民地市场,又相继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北方公司、近东公司等贸易公司。同时还大力发展航运事业,提高造船能力,在法国建立起一支大型的商船队。此外,还拨出巨款改良道路、开凿运河,连接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南运河就是在1681年完成的。

④ 在农业方面,柯尔贝尔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对农作物的种植实行奖励办法,减轻农民某些赋税负担,帮助农民开垦土地,兴修水利灌溉系统等。但在在这方面所下的力量并不很大。

影响 柯尔贝尔上述经济政策的实施,对法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造成了一时的繁荣景象。当时,法国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很快,手工工场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工业技术水平在欧洲大陆国家中名列前茅,有许多产品特别是象珠宝首饰、地毯、花边、瓷器、家具等高



路易十四执政时期(1661~1715)的法国经济

级消费品,一直畅销国内外,在欧洲享有盛誉。但是,这种情况在柯尔贝尔去世后不久就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经济衰退的现象。许多手工工场纷纷倒闭,出口贸易的收入日渐减少,国家财政赤字也越来越大。造成经济恶化的原因很多,比如路易十四挥霍浪费、战争的消耗破坏和农业的灾害荒歉等。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封建关系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专制政权方面,企图依靠国家的力量来消除封建制度本身所造成的落后性,而柯尔贝尔却想利用旧的统治工具来发展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这本身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能不发生冲突。更何况作为柯尔贝尔政策理论基础的重商主义学

说,由于时代的变迁,已逐渐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柯尔贝尔重商主义政策的历史局限性。

参考书目

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1册,第3章,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

(朱克燎)

kexue jishu geming

科学技术革命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在科学技术起决定作用下而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革。它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导致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变革。

18世纪中叶以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社会生产力的飞跃,经历了三次科学技术的革命。

第一次科技革命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所发生的产业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以后所经历的第一次科学技术上的变革。这次科技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

蒸汽机的发明,是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蒸汽机可以产生出完全受人控制的动力,又可以移动,不象利用水力作动力要受地理位置的限制,从而可以普遍运用,使现代大工业很快地发展起来。所以恩格斯指出,蒸汽机是第一个真正国际性的发明,它“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1页)。1784年,英国第一座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纺纱厂建成,大大提高了棉纺织业的生产效率和机械化程度。这种蒸汽机很快地被推广开来,使其他轻工业部门也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轻工业部门的机器发明和广泛应用,又推动了重工业和运输业的技术革新,使社会生产力出现了惊人的发展。到19世纪30年代末,英国首先完成了产业革命。美、法、德、俄、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在19世纪内,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不仅使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飞跃发展,也使人与人之间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产生了新型资本家和新型工人——产业工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并简单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基本阶级。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被确立起来,资本主义制度从此在人类历史上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二次科技革命 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又出现了新的科学技术上的进步。特别是1873年以后,掀起了一次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高潮,它以新式炼钢法和电力的应用为主要标志,通常被认为是人类近代史上的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

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技术的进步,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在冶金工业中,发明了新的炼钢法,其中,以马丁炼钢法和托马斯炼钢法最为突出。新炼钢法大大提高了当时的炼钢技术,有力地促进了大型炼钢厂和冶金厂的建立。与此同时,苯胺染料的发明,钾基肥料以及硫酸和苏打的出现,给现代大规模化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化学方法从此日益广泛地被用于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19世纪最后30年,发电机、内燃机、蒸汽涡轮的应用,以及以新型发动机为基础而发明的电车、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在这次科技革命中,电作为一种可利用的能源,成了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电力已开始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使得许多国家的工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工业中,原来占优势的纺织工业等轻工业部门,就让位给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等重工

业部门了。

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使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家之间竞争和兼并的激化,使资本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里,导致垄断的产生。在这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垄断逐渐地代替了自由竞争,形成了垄断组织和金融寡头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它发展中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

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人类历史上又出现了以核能、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

这次科技革命在20世纪40年代末从美国开始,以后逐步扩展到西欧、东欧和日本,并在60年代达到高潮。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一次科学技术上的重大变革。它不仅在个别科学理论上和生产技术上有突破,而且几乎是在各门科学和技术领域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迅速引起了社会生产力的更大飞跃。这次科技革命发生后,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迅速崛起,如高分子合成工业、核工业、电子工业、半导体工业、航天工业和激光工业等等。实行生产的全面机械化和自动化,采用最先进的电子控制装置,是这次科技革命的一大特点。电子计算机的生产日新月异,从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参见彩图插页第108页)开始,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电子计算技术就以其惊人的速度突飞猛进,不断更新换代,它的元件技术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四代,目前正在向第五代迈进。航天技术的发展,是科技革命的综合性产物。从50年代后期出现人造卫星以后,又进行了载人宇宙飞行、登月活动,以及对火星、土星及太阳系其他星球进行探测,揭开了人类向宇宙空间迈进的序幕。航天技术的发展将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近年来,人们在议论将爆发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或叫“第四次产业革命”、“新产业革命”的问题。他们预测一场新的世界科学技术革命将在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蓬勃兴起。这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是指以电子计算机为主的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发展,其中包括生物工程、光导纤维以及新材料、新能源、海洋开发等领域。它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新飞跃和经营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比之前几次科学技术革命来说,对人类发生的影响将更加深远。

18世纪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起到了进一步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而在那次技术革命中迸发出来的强大生产力,从经济上显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之封建制生产关系的进步性。100多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已日益显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同社会化的大生产的发展相冲突,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更趋尖锐。事实上,1973~1975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已使西方各国长期处于“滞胀”(见停滞膨胀)状

态。1980年前后,各工业国家的经济又先后陷入衰退。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不仅预示着传统“大烟囱工业”的没落,并反映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趋于激化。总之,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生产走向更全面的社会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另一方面,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王同勋)

kebian ziben

可变资本 (variable capital) 不变资本的对称。资本家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一部分资本。

资本家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把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原料、辅助材料和燃料等,另一部分则用来购买劳动力,即雇用工人。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是改变自己的形式,把本身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不能改变自己的价值量,所以马克思称它为不变资本。而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则不同,在生产过程中,它被发挥作用的活劳动力所代替,而劳动力的实际使用就是劳动。劳动有两重作用:作为具体劳动,它把生产资料的旧价值保存下来,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作为抽象劳动,它又创造一个新价值。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不但能补偿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即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所支付的等价物,而且还能生产出一个价值余额即剩余价值。由于购买劳动力的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会发生价值变化,从而增殖自己的价值,成为一个可变量,所以马克思把它称为可变资本。由此可见,可变资本的本质特征是:“一个既定的价值额……和一个会自行增殖、会创造价值的力即劳动力相交换,而劳动力不仅再生产它自己的由资本家支付的价值,而且同时生产剩余价值,即原来不存在的,没有用任何等价物买来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43页)。当然,这部分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只是可能的可变资本,这部分资本只有当它购买了劳动力,转化为劳动力,并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后,才成为现实的可变资本。

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在政治经济学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把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这种划分方法,一直被他们沿袭下来,用以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是马克思第一个提出来的。这种划分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现实运动的基础,从而也是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运动的基础。它揭示了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并不是全部资本带来的,而只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从而只是可变资本自行增殖的结果。通过这种划分,还可以把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相比,计算出剩余价值率,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又是马克思所创立的资本有机构成学说的基础,在这个学说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这个学说的基础上,马克思还揭示了剩

余价值和利润,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内在联系和区别等等。所以,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问题的钥匙。

(弓孟谦)

kefenpei zongshouru de fenpei

可分配总收入的分配 (distribution of distributional revenue) 中国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单位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经营所得中可直接用于分配的那一部分收入(简称总收入)的分配。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农业中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

总收入的构成 包括农业生产单位当年可以实现其价值的产品价值和非物质生产的收入。农业生产单位一年内进行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等生产活动所获得的物质产品的总额为总产品,用货币计算的农业总产品称为农业总产值。其中,当年可以实现其价值能够用来进行分配的部分,计入农业生产单位的总收入之内;而当年不能实现其价值的部分,如越冬作物、正在培育中的苗木、未捕捞的水产养殖品、饲养中的畜禽等各种在产品或中间产品的价值,以及某些自建的固定资产和林木、果树、役畜等固定资产的自然增值等则不计入总收入。此外,农业企业的非物质生产收入,如各种劳务收入、存款利息、对外投资所得的利润和出租各种生产设施所得的租金等亦包括在农业生产单位的总收入之内。因此,可分配总收入同农业总产值在质与量上都有所不同。

总收入的具体分配 按以下方法进行:①提留当年已支出的各项生产费用,包括种子费、肥料费、农药费、饲料费、水电费、机械作业费、维修费等等,以补偿当年生产费用的消耗。②提留当年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以补偿固定资产的消耗。③提留管理费。④向国家交纳税金和支付贷款利息。⑤提留公积金,用来进行扩大再生产。⑥提留公益基金,用作集体文化福利事业的开支和补助困难户。⑦提留预备基金。⑧扣除上述各分配项目后的余额,作为在劳动者之间进行按劳分配的个人消费基金。在实行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情况下,各部分分配的多少和比例由集体统一安排;在实行统一经营和分户经营相结合的联产承包的管理体制的情况下,由两个经营层次按照合同规定分别安排。

总收入的分配原则 主要有:①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积累指从总收入中提留的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是保证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消费指总收入中用之于个人和公共消费的部分,是保证农业劳动者生活需要的物质条件。在农业生产单位一年内总收入既定的条件下,积累增加就要减少消费,消费增加就要减少积累。为了既保证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保证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在一般情况下必须使两者同时都有所增长。②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关系。在农业生产单位总收入的分配中,有些项目是国家整体利益的需要,有些项目是企业利益的需要,有些项目是劳动者个人